

凡是錯誤的思想，凡是毒草，凡是牛鬼蛇神，都應該进行批判，决不能让它们們自由泛滥。

毛澤東

邓拓的《燕山夜话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

编者 林 杰 马泽民 阎长贵 周 英 滕文生 靳殿良

前 言

从一九六一年以来，邓拓在《前线》《北京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等报刊上，发表了一系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，对党对社会主义进行了猖狂的进攻。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，当时即激起了许多同志的反对，他们给《前线》《北京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写文章，提出了批评。但是，《前线》《北京日报》《北京晚报》却扣压起来，不予发表。

最近，由于吴晗、廖沫沙等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的大暴露，邓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面目再也无法掩盖了。因此，《前线》和《北京日报》才匆匆忙忙地发表了

《燕山夜话》的摘要材料，加了编者按。

《前线》《北京日报》的这个编者按，不提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，在这个思想指导下，所编的关于《燕山夜话》的材料，也是竭力掩盖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。

我们认为，邓拓的《燕山夜话》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。我们根据自己的看法，也摘编了《燕山夜话》的材料，并加了按语，请大家加以对照、比较，进行研究。

二、反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、大跃进、攻击无产阶级专政

污蔑我们的大跃进是“吹牛皮”、“说大话”，在事实面前“碰得头破血流”

“有的时候，看看外国的民间故事和寓言，益处很多。……如果有举一反三的理解力，那末，无论什么妖魔鬼怪，要出多少花招，都将被你的慧眼一一看穿。”

“且看《伊索寓言》吧。比如，那上边有一个故事说：‘有五种杂技的人，平常因为缺少勇气，被城市的人所非难，暂时出外旅行去了。过了些时回来的时候，很说些大话，说在别的城市表演过英美的竞赛。在罗陀斯地方，曾跳得那么远，没有一个奥林匹克选手能及得上。’他还说，那里在场的人可以给他作证，假如回到那里去的话。当时在旁边有一个人喊道：‘喂！朋友！假如这是真的，你也不要什么见证，因为这里就算是罗陀斯，你跳好了！’”

“事实显然证明，说大话的只能吹牛皮，决不能采取行动。直到如今，这样吹牛的人物，随时随地都可以遇见。他们之中，牛皮吹的大小虽然有所不同，但是，其为吹牛皮。”

“这个寓言同样可以启发人们辨认出诡计多端的吹牛家，便于揭穿他的牛皮。”

与伊索的这个寓言有异曲同工之妙的，还有克雷洛夫的另一个寓言。他说：“山雀飞到海上去，它夸口说，要把海水烧干。……，要听谣言的人，听了迅速地传播开来的传说，首先就带了汤匙到海边去赴宴，去尝那丰美的鱼汤。”

“马赫派等大师们所谓‘心理要素’的作用，大吹牛皮。这同山雀要把海水烧干的胡说岂不是一样的吗？然而，马赫派自以为凭着他们的心理要素的作用，就能够有所作为，而其结果，只能在实际的事物面前碰得头破血流，最后必然要宣告马赫派的破产。”

《两则外国寓言》，《燕山夜话》五集，第八九——九三页。

原载《北京晚报》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六日。

按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，这是恶毒地咒骂我们的大跃进是“吹牛皮”，在事实面前“碰得头破血流”了。如果不是这样，为什么邓拓不厌其烦地大讲有“深远的意义”，值得“深思”呢？为什么叫喊直到今天，吹牛皮的人“随时随地都还可以遇见”呢？既然是讲故事，为什么又扯到马赫派的“心理要素”作用呢？大家知道，帝国主义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曾经攻击我们的大跃进是“说大话”，是“冒险的冒险”，是“唯意志论”。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诬蔑我们的大跃进是“升虚火”、“发高烧”，是“唯心主义”。请看，这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？！

“看过《三国演义》的人都记得，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，曾经提到刘备生前说过，马谡说过什么话，不可大用。……刘备对于马谡的了解，实在是很深远的。马谡在刘备的嘴里就是一个好说大话的人，说大话的害处古人早已深知，所以，管宁说：‘言不啻过其实，实不啻过其名。’这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听大话，不要吹牛，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，话要说得少些，事情要做得多些，名声更要小一些。”

“据汉代的学者王充的意见，似乎历来忽视这个道理的以书生或文人为最多。王充在《论衡》中指出：‘儒者之言，溢美说大’，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，文人之流往往爱说大话。其实，爱说大话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，决不只是文人之流而已。”

“陆灼讽刺孙氏族孙堂曾奢靡三千食客，就胡乱吹牛皮说自己也有三千食客，可是经不住实地观察，一看就露底了。陆灼写出这个说大话的故事，其目的是要教育世人不可吹牛。”

“历史上说大话的真人真事，虽然有许多，但是这些编造的故事却更有概括性，它们把说大话的各种伎俩集中在典型的故事情节里，这样更能引人注意，提高警惕，因而也就更有教育意义了。”

《说大话的故事》，《燕山夜话》五集，第八八——八九页。

原载《北京晚报》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一日。

“王安石是宋代革新派的大政治家。他有许多革新的思想，但是缺少实际知识和丰富的经验。宋代张来的《明道杂志》说：‘王荆公为大，讲天下水利。时至有唐干湖，云可得良田数万顷。人皆笑之。荆公曰：与家语及之，时刘蕡父学士在坐，遽对曰：此易为也。荆公曰：何？’又黄父曰：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溪。公大笑。”在王安石当政时期，类似这样的笑话还有不少。这些无非证明，王安石有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。特别是他很不虚心，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大毛病。”

《多少学问》，《燕山夜话》二集，第八四页，原载《北京晚报》一九六一年四月二日。

污蔑我们党“自食其言”，“不堪信任”

“世上有病的人很多，……其中有一种病症，名叫‘健忘症’。谁要是得了这种病症，就很麻烦，不容易治好。”

“得了这种病的人，……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，甚至使人怀疑他是否装疯卖傻，不堪信任。”

“明代陆灼的《艾子后语》中记载了一个故事，可以当做健忘症的一个典型病例。他写道：

“齐有病忘者，行则忘止，卧则忘起。其妻患之，谓曰：闻艾子滑稽多智，能愈膏肓之疾，宜往师之？”其子曰：善。于是乘马执弓矢而行。未一舍，内遁，下马而便溺，矢遗于土，马系于树。便讫，左顾而暗其矢，曰：危乎，流矢奚自？几乎中我！右顾而暗其马，喜曰：虽受虚惊，亦得一马。引臂将旋，忽自践其所遗粪，顿足曰：脚踏大粪，污吾履矣，惜哉，鞭马反向归路而行。须臾抵家，徘徊门外曰：此何人屋？岂艾夫子所寓者？其妻迎之，知其又忘也，骂之，其人性然曰：娘子素非粗人，何故出语伤人？’看来这位健忘者的症状，已经达到相当严重的地步。但是，他们还不能估计这种病症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，会变成什么样子，大概总不外乎典型或者变通这两个结果。”

据中国古代医书记载，……这种病的一个起因，是由于所谓气脉颠倒失常，其结果不但不是健忘，而且慢慢地变成喜怒无常，说话特别吃力，容易发火，最后就发展为癫狂。还有一种病症，则是由于脑髓受伤，一阵阵发麻，心血上冲，有时不免昏厥，如果不早治，必致成为傻子。如果发现有这两级化任何一种的现象，必须赶紧完全休息，什么话都不要说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做，勉强说说话事，就会出大乱子。

那末，对这种病症，难道就没有一点积极治疗的方法吗？当然不是。比如……在发病的时候，马上用一盆凉水，从病人的头上淋下去，然后再用冷水冲凉，可使神志稍清，……现代西医的办法，有的是在发病的时候，用一种特制的棍棒，打击病人的头部，使之‘休克’，然后再把他唤醒。”

《专治“健忘症”》，《前线》一九六二年第四期。

按：这显然是一篇咬牙切齿地攻击我们伟大的党的杂文。查遍医书，从来没有说健忘症的症状是“自食其言，言而无信”、“喜怒无常”，“发疯”，“发狂”。更没有用狗淋头和用水棍把病人打昏过去这种办法治疗健忘症的。明陆灼的《艾子后语》是政治讽刺小品，而不是医书。邓拓这里讲的是政治，而不是医道。这是铁一样的事实。

咒骂我们党的领导是“带汁的诸葛亮”

“带汁的诸葛亮是最要不得的。这个名目见于岳飞孙子岳珂的《程史》第十五卷《郭倪自比诸葛亮》的一条记载中。据称：‘郭稼师准东，实筑二城，倪从焉。……议论自负，莫敢覆者。一日，持扇题其下计：三顾频烦天下计，两朝开济老臣心。盖意以孔明自许。……余至涪，正暑，见其坐上客席，果有此句，然后知所闻为不诬也。俾既济于符离，倪又败于真，自度不复振，对客泣数行。时彭汝楫为法曹，好谈，适在座，谓人曰：此带汁诸葛亮也。传者莫不拊掌。倪知而怒，将罪之，会去，遂止。”

“象郭倪说这种带汁的诸葛亮，简直令人发笑，也令人发愤。然而，这也证明，冒充诸葛亮来攻击诸葛亮是吓不住人的，总有一天要原形暴露，被天下人所耻笑。”

《三种诸葛亮》，《燕山夜话》四集，第十二页。原载《北京晚报》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。

按：邓拓大谈所谓“带汁的诸葛亮”，说什么“冒充诸葛亮，假装诸葛亮”总会有一天“要原形暴露”，这到底是指谁呢？如果是指地主资产阶级，就不必这样隐晦。因此，它只能是在辱骂我们党的领导。

恶毒地攻击东风压倒西风的科学论断，是“伟大的空话”，是“陈词滥调”

“有的人擅长于说话，可以在任何场合，嘴里说个不停，真好比悬河之口，滔滔不绝。但是，听完他的说话以后，稍一回想，都不记得他说的是什么了。”

“说了半天还是不知所云，越解释越糊涂，或者等于没有解释。这就是伟大的空话的特点。”

“不能否认，这种伟大的空话在某些特殊的场合是不可避免的，因而在一定的意义上有其存在的必要。可是如果把它普遍化起来，到处搬弄，甚至以此作为专长，那就相当可怕了。假若再把这种说空话的本领教给我们的后代，培养出这么一批专家，那就更糟糕了。”

“凑巧得很，我的邻居有个孩子近来常常模仿大诗人的口气，编写了许多‘伟大的空话’，……不久以前，他写了一首‘野草颂’，通篇都是空话。他写的是：

‘大东是我们的父亲，
‘老东是我们的母亲，
‘太阳是我们的保姆，
‘东风是我们的恩人，
‘西风是我们的敌人。’”

“这首诗里尽管也有天地、父母、太阳、保姆、东风、西风、恩人、敌人等引人注目的字眼，然而这些都被他滥用了，变成了陈词滥调。”

“即使使用了最伟大的字眼和词汇，也将无济于事，甚至越说得多，反而越糟糕。因此，我想奉劝要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，还是多谈、多想，少说一些，遇到要说话的时候，就去休息，不要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力吧！”

《伟大的空话》，《前线》一九六一年第二十一期。

按：“东风压倒西风”这个科学论断，是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，毛主席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提出来的。它形象地指明了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，社会主义力量已经压倒了帝国主义的力量。东风，就是无产阶级和亚非拉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力量；西风，就是腐朽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。歌颂“东风”，憎恨“西风”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为什么邓拓却偏偏把“东风”是“恩人”、“西风”是“敌人”的说法，诬蔑为“伟大的空话”，诬蔑为“陈词滥调”呢？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曾经煽动地说：“必须更勇敢和坚决揭露关于荒唐无稽的‘西风’和‘东风’的竞争的教学主义理论。”在这里，邓拓同赫鲁晓夫唱的是一个调子。

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党的领导“自作聪明，看不起群众”

“人的智慧决不是无限制的。要想任何东西都知道，拥有无穷的智慧和，那不过是愚夫的梦想而已，实际上绝对不可能做到。……有一种人看来好像很聪明，严格说来，只不过是假聪明或者是聪明罢了，算不得真聪明，更算不得大聪明。”

“老子和后来的六国诸侯，各执一偏，要么就主张绝圣弃智，否定一切；要么就凭着各自的明智，盲目自信，结果当然都不美妙。他们的毛病就在于不重视群众的智慧。”

“最好的计谋只能从群众中产生。汉元帝时的宰相匡衡，曾经在他的奏议中说：‘臣闻广谋从众，则合于天心。’……汉光武帝时著名的学者郑兴，也曾给过告劾奏，要‘博采广谋，纳群下之策’。宋代范仲淹的儿子范杲夫，曾经劝告司马光说：‘愿公虚心以闻众论，不必谋自己出。谋自己出，则治乱得乘间而合矣。’这些古人的见解都很正确。特别是范杲夫所说的‘不必谋自己出’，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。有的人常常喜欢自己逞能，自作聪明，看不起群众，不管什么事情总是要自己出主意，企图出奇制胜，而不接受下面群众的好意见。有这种毛病的人，如果自己不觉悟，不改正这种毛病，终久会有一天要吃大亏。”

《智慧是可贵的吗？》，《燕山夜话》四集，第十七——十九页。原载《北京晚报》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。

按：在今天，邓拓大谈什么匡衡劝汉元帝“广谋从众”，郑兴劝汉光武帝采“纳群下之策”，这是什么意思

按：邓拓反复地攻击所谓说大话、吹牛皮，并说，爱说大话的“决不只是文人”，而且还有“大政治家”。他这是讲历史吗？不是，这是借古讽今，这是妄想煽动人们反对党的总路线，攻击大跃进，这是

污蔑我们党在大跃进中不爱护劳动力

“早在春秋战国及其前后的时期，许多古代的大政治家已经知道爱护劳动力的重要意义。……他们通过自己的统治经验，却也发现了所谓‘使用民力’的‘限度’，实际上就是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某些客观规律。”

“《礼记》《王制篇》写道：‘用民之力，岁不过三日。’元代的学者陈桢注解道：‘用民力，为治城郭、造桥、沟渠、官廨之类。’其实，用现代的话来讲解，这就是指的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。按照当时社会的生产力水平，古人规定了各种基本建设所用的劳动力，大致只能占总劳动力的百分之左右。现在看来，这个比例对于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古老国家是适当的。”

“晋国的狐偃为公子重耳策谋说：‘蓄力一纪，可以远矣。’一纪是十二年。当时狐偃伴随着重耳正走过卫国的五鹿，他就预言：‘十有二年，必获此土。’……从这个故事看来，象狐偃这样的人，在古代的历史条件下，总算是懂得积蓄力量的了。纪元前七世纪的古人尚且懂得这些道理，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更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。”

“他们应该从古人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。”

《爱护劳动力的学说》，《燕山夜话》一集，第五六——五八页。

原载《北京晚报》一九六一年四月三十日。

按：说古人“发现了劳动力消长的规律”，这完全是瞎说。又说“我们生当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然就应该更清楚地懂得这些道理”，还要我们“从古人的经验中得到新的启发”，这显然是攻击我们在大跃进中、在基本建设和兴修水利中，不爱护劳动力。

污蔑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“完蛋”了

“的确，任何巨大的财富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，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。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，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样。但是，这并不是说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，你只要要了一个鸡蛋，就等于有了一份家当。事情决不可能这样简单和容易。”

“明代万历年间，有一位小说家，名叫江盈科。他编写了一部《雪涛小说》，其中一个小故事说：‘一市人，贫甚，朝不谋夕。偶一日，拾得一鸡卵，喜而告其妻曰：我家有当矣。妻问安在？持卵示之，曰：此是，然须十年，家当乃就。’因与妻计曰：我持此卵，借邻人伏鸡哺之，待彼破壳，就中取一雏者，归而生卵，一月可得十五鸡。两年之内，鸡又生鸡，可得鸡三百，鸡易十金。我以十金易母鸡，行复生卵，三年可得二十五牛。牛行生卵者，又复生牛，三年可得百五十牛，鸡易三百金矣。吾持此金以举债，三年间，半千金可得也。”

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多情节，没有多大意义，可以不必细说它。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，就是这个财迷说，他还打算要一个小老虎，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“勃然大怒，以手击鸡卵，碎之”。于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全部破掉了。

你看这个故事的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？这个财迷也知道，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。因此，他同老财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得到这份家当，这似乎也合乎情理。但是，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，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说，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说的结果为前提。对于十一年以后的事情，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，充分显示了财迷的本色，以致激起老婆生气，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。”

《一个鸡蛋的家当》，《燕山夜话》一集，第七六——七七页。

原载《北京晚报》一九六一年六月十八日。

按：我们党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计划时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扬言说：“有几分真实性，须要看看”；当我们遇到困难时，他们又攻击我们的大跃进“失败了”，“垮台了”。邓拓在这篇杂文中说什么想入非非，“用空想代替了现实”，“一个鸡蛋的家当”“全部毁掉了”。这不是也攻击我们的大跃进“失败了”吗？这不是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一唱一和吗？

（下转第三版）

